

「印象」的印象

● 鄧雲鄉

「印象書系」，第一輯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1997）。

學林出版社出了一套「印象書系」，由五位編者編了五位名人的印象。我收到出版社寄贈的一本《沈從文印象》，因為書中選了我回憶沈從文師的一篇文章，在書的後面封頁上印着「印象書系」第一輯的整個書名，簡單說，也就是五個人名：胡適、魯迅、周作人、老舍、沈從文五位大師的印象。住處離五角場不遠，那裏有家大書店，那天去閒逛，看到這幾本書居然全有，便把另外四本買了回來，湊成一套。連日翻閱，除魯迅先生外，這些位先生的音容笑貌似乎一一浮現眼前，恍如回到半個世紀前，一一面對時的情景了。為甚麼說除魯迅先生之外呢？因為魯迅先生我沒有見過，我幼年在北京時，先生已在上海，我剛進中學不久，先生便在上海去世了。而其他幾位先生，

有的是畢業那年的校長，有的是上課的老師，有的是在偶然的機會中有過接觸、見過幾面的，所以或多或少都有印象。多的自然有豐富的回憶內容；少呢？雖然不夠豐富，卻也不能不說是深刻的印象。為此，忽然想起寫這篇〈「印象」的印象〉，即讀了書中的「印象」，談談我自己的印象也。

初掌北大的胡適之

先說胡適之校長。胡校長是抗日戰爭復員後北京大學的校長，我是1947年北大中文系畢業的。1946-1947年我讀大四，正是胡先生掌校之初。1946年暑假期間，我還住在紅樓後面、大操場北頭「七七」戰前蔣夢麟校長為研究生蓋的那幢宿舍中。那是當時北京各大學中最好的宿舍，分「天地玄黃、宇宙洪荒」八個樓門號，是橫着南北兩排，西面又有縱向一排樓連接。中間有堵短牆把東西部隔開，西部住女生，多

學林出版社出了一套「印象書系」，由五位編者編了胡適、魯迅、周作人、老舍、沈從文五位大師的印象。其中幾位先生，有的是我畢業那年的校長，有的是上課的老師，有的是在偶然的機會中有過接觸、見過幾面的，所以也想談談我自己的印象。

父親是清末受教育的，平時最看不起白話文，常與我的家庭教師王成邦先生聊天說笑話。甚麼「胡適為甚麼不叫『往哪兒去？』、胡適在家請人教他兒子唸四書、五經，卻鼓吹別人兒子學白話文……」

東西向房。東部「天地玄黃」四門，住男生，自偽北大文學院時即如此。我住天字樓二樓朝北一間，上樓梯即是，十分方便。出來就是大操場，右側一長條短牆，同學們多貼各種告白，即後來有名的「民主牆」，中間有個很寬的缺口，沒有按門，但卻是紅樓、操場、灰樓宿舍通向西門的要道。一出缺口，右手北面，先是一小片空地，幾株槐樹，接着便是學校總辦公處的大紅門，中式院落，前後兩進。再前面，右手是圖書館大樓，樓後面一小院落，是訓導處辦公室。再往前，往北一條引路通往後面文學院灰樓。正面是西門，出去對面就是景山東街了，由此可到二院（即理學院），南北的街即漢花園、松公府夾道。胡校長的墨綠色雪佛蘭汽車，經常停在總辦公處大門外槐樹下，西門現在還在，位置未變，只是中式門樓拆改為西式鐵柵欄門了。去年十月回京，我還在門口拍過照片。圖書館樓窗外長春藤已經爬滿，只不知裏面情況如何了。

1946年暑假我仍住灰樓宿舍，經常出入經校辦門前，見胡校長的汽車停在那裏，而人尚未見到。有一天下午四、五時之間，我又經過這裏，邊上一個布告牌，上有新布告，我正觀看，見司機由大門側門房出來開車門，後面胡校長手中捧着一大疊書走出來上車，黑邊圓眼鏡，白黃本色紡綢大褂，頭髮已顯花白了。因為正迎面，我便讓在一邊，行個鞠躬禮，叫聲胡校長。胡先生朝我看看，微笑點頭示意，並未說話，便上了汽車，司機關上車門，開走了。這是我作為北大學生

第一次見到校長。但並不是平生第一次見胡先生，那還要推到九年前，即1936年5、6月間在中山公園。因為當年胡先生名氣太大，我還是北國山村作孩子時就十分熟悉的。父親客廳書桌上就放着整套的《胡適文存》，當時鄉間平裝書少，所以我印象十分清楚。父親是清末受教育的，平時最看不起白話文，常與我的家庭教師王成邦先生聊天說笑話。甚麼「胡適為甚麼不叫『往哪兒去？』、胡適在家請人教他兒子唸四書、五經，卻鼓吹別人兒子學白話文……」但教我唸四書、古文、看國語課本。作文既作文言，卻又作白話文。1935年到了北京，正是胡先生住在米糧庫，管庚款教育基金兩千萬銀元，當北大文學院長、庚款教授，月入薪金版稅等將近千元，春秋鼎盛的風光時代。報紙、雜誌經常刊登先生照片，當時北平社會上一般都認識這些名教授。當時北平文教界人士，有夏日三天兩頭、甚至天天下午逛公園坐茶座的習慣。有一天我隨父親去公園，正在入口處，忽聽後面有人說英語，略一回頭，只見胡先生穿一咖啡色毛料長衫同兩位西洋人邊說邊談走進來。父親拉我一把讓在旁邊，讓這幾位先過去，我們隨後進來。本來按習慣我們來公園進門後不是走大路經「公理戰勝」石坊，邊看花、邊散步折而西到春明館、長美軒一帶茶座，就是沿西面長廊看金魚、再到這一帶。總之，很少往東走。而胡先生同外國友人是習慣去「來今雨軒」的，進門便折入東面長廊，逶迤而去了。這天父親出於好奇心，也便拉着我上了東面走

廊，自然地也向東面走去，轉了兩個彎，已到了「來今雨軒」茶座罩棚下，我們遠遠看着茶房招呼胡先生同西洋友人坐下，但沒有進去。從邊上下台階繞董事會院門往後面去了，父親在往後面的路上，一邊誇胡先生學問多麼好，英文多麼好，二十多歲就當北大教授，教育我應該好好用功……再不說「往哪兒去」等笑話了。當時胡先生同西洋友人隨意閒談、神采奕奕的神情，就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……等到飽經淪陷、日寇燒殺、極度飢餓之後，盼得勝利到來，仍是漫天烽火，茫然無主之際，忽又在北大總辦事處門前重見到胡校長短暫的一剎那，只見先生花白雙鬢，夾着書上汽車，一派滄桑老態。戰前的那種神采奕奕的情態一點也看不見了……

當時學生運動極為劇烈，各派學生針尖對麥芒，更是尖銳。但北平當地學生，則更多的是在家中為個人的生活萬分困難、為吃飯而發愁忙亂。有一次系中開會，胡校長要來參加，後面灰樓最大的階梯教室，各年級同學坐得滿滿的，氣氛極為緊張，大有在會上唇槍舌劍、大幹一場的形勢。胡校長和楊振聲先生、唐蘭先生緩緩走入會場，場上鴉雀無聲，胡先生先走上講台說道：「今天這個會場為甚麼嚴肅得像個法庭？」一句話道破場下的緊張氣氛，坐在前面的一些小伙子都啞口無言了。胡校長接着就講起來，大家都注意聽先生說話，有些準備提問題質問的，也自動一聲不哼，會議以緩和的氣氛收場了。這次會議的情景我在另外文章中曾詳

細描述過，在此就不多贅了。還有一次大概是1946年末吧，北平市長何思源氏到北大來，不知道是為甚麼事情，被學生知道了，聚了許多人攔他的汽車，不讓他走，要質問他。胡校長親自坐在車中保駕，送他經景山東街回市政府，經過西齋門口時，有人喊：「何思源、何不思源？」西齋擁出來的學生群情激動，胡校長手伸在車窗外，不斷叫：「同學們，不要激動！不要激動！……」印象如在目前，轉瞬半個多世紀過去了。

《胡適印象》選的文章很客觀，各種觀點的都選到了，後面選了胡思杜的〈對我父親——胡適的批判〉。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人，馬上會回憶到極左思潮時代的威力有多麼大？多麼恐懼？到反右鬥爭時，胡思杜仍然無可奈何地自殺死去。前些日子《文匯讀書周報》刊載了一篇胡思杜自殺的經過，可惜沒有作為附錄收入，或在後面附言中略加說明。不然，不知者以為胡思杜真是一個「革命者」了。1993年8月我去台灣中研院文哲所訪問，在南港街頭閒逛，入一小書店，見有李敖著的《胡適傳》，我不知李敖為何人，拿起一翻目錄，只見目錄中一行：「一個小寡婦」五字，我忽然想到「輕薄口吻、心術不正」八字，中國語言可選擇的同義詞多的很，為甚麼專選這樣的詞語呢？我不想再看下去，歎口氣把書放下了。回到中研院，在文哲所、近代史所聽朋友們一介紹這位作者，我才明白，原來如此！而這本《胡適印象》中，也選了李敖的文章，不免感到些遺憾了。

大概是1946年末，北平市長何思源氏到北大來，許多學生攔他的汽車，不讓他走，要質問他。胡校長親自坐在車中保駕，他的手伸在車窗外，不斷叫：「同學們，不要激動！不要激動！……」印象如在目前，轉瞬半個多世紀過去了。

再說知堂老人

談完胡適之先生，再說知堂老人。

日寇侵華，淪陷後期，我轉學考入在沙灘紅樓的偽北大文學院。當時是周作人當院長的，好像也兼系主任，而沈啟无先生已因與周鬧翻，破門例離開文學院。中文系教授有容庚、許世瑛、趙蔭棠、黃公渚、朱肇洛、陳介白、尤炳奇等位。外文系英文是徐祖正主任，法文是鮑文蔚主任，日文也是周自己兼，歷史系馮成鈞，哲學系楊丙辰等位先生，都是「七七」戰前老北大的舊人。住宿舍，我先住南鑼鼓巷宿舍，後來搬到紅樓後灰樓天字樓二樓，這是一人一間的宿舍，因高一班的同學周振傑兄結婚，把他的房間讓給我的。住到1946年深秋，聯大復員，北大恢復，灰樓全讓作女生宿舍，我又搬到西齋東院第三排為止。日寇投降，偽北大照常開學上課，我讀三年級。周先生平日作院長、系主任，中文系一、二年級他並不開課。偽北大文學院人不多，學生、教師之間都認識，但不開課時，見面只行個禮，叫聲「先生」，也沒有說話的機會。三年級時，他照例開「佛教文學」，也稱「佛典文學」，原是老北大時就開的課。張中行先生在其回憶文章中就記到過。這一年自然照開，只是他未親自來上課，而是讓許世瑛先生來代上。課程表上仍寫着他的名字。許先生來上課時，也特地聲明一番，說是周先生因身體健康關係，不能來上課，由他來代。大家自然知道原因，也不多問。而周先

生每日還照樣坐包車來校。當時紅樓前已非「七七」戰前停滿包車、汽車的風光可比。只有先生一輛車，白銅飾件，黑大絨靠墊，車是十分考究的，來了就到一樓東樓道系辦公室。我因想辦一個小雜誌，曾去找先生約過稿，當時陳介白先生也在座，我已在另外文章中寫到過，不多說了。

抗戰勝利後偽北大開學上課時間不長。不到兩個月，重慶教育部就派沈兼士、陳雪屏等先生來接收，各所偽大學合為臨時大學，文學院為第二分班。中間幾乎沒有停課，記得只空了一個星期，就仍在原來紅樓上課了。只是偽北大教師都解聘，換了一些先生上課。如原黃公渚先生《楚辭》，由顧隨先生上。容庚先生古文字甲骨文由于省吾先生上，還有趙萬里先生來上目錄學，周祖謨先生補音韻學的課等等。他們都是淪陷時期在北京輔仁、中國大學等校任教的先生，不少都認識，沒有任何隔閡。淪陷區同時生活在北京古城的學人，不管在偽北大的或在輔仁、中國等教會、私立等大學教書的人，對周都能同情、理解，沒有一人以「附逆」而歧視之。這從周入獄後所有學人為其上書陳情中可看出。先是俞平伯先生在1945年12月28日自老君堂79號給胡適先生寫長信為周陳情喊冤，函中云：「在昔日為北平教育界擋箭之牌，而今日翻成清議集矢之的，竊私心痛之……」函中詞意懇切，洋洋近二千言。惜陳子善兄編知堂回憶文集時，還特地向俞先生約稿，垂暮之年的俞先生以「我不寫」三字答之。子善兄着了慌……

不管在偽北大的或在輔仁、中國等教會、私立等大學教書的人，對周作人都能同情、理解，沒有一人以「附逆」而歧視之。由於胡適先生在北京與《大公報》記者公開說：「我與周仍舊是朋友」，上海報紙隨後就大作文章，嚷成一片……。

其實當時為甚麼不把此信收入呢？不是勝過回憶文章萬萬千嗎？1946年6月18日，北京淪陷時留平多名教授又聯名向法院上書說情，題為〈服務偽組織之經過〉，列名者沈兼士、董洗凡、張懷、顧隨、陳雪屏、俞平伯、鄧以蟄、孫人和、王之相、陳君哲、陸佛萬、孫幾伊、童德禧、武夢佐共14名。其中沈兼士是1942年年末輾轉去重慶，後來又回來作教育部特派員的。陳雪屏是臨時大學負責人，後來是北大訓導長。隨後又有臨時大學徐祖正、楊丙辰等54名教授聯名上書，為周說情。但當時左右鬥爭劇烈，胡適先生在北京與《大公報》記者公開說了「我與周仍舊是朋友」，這樣上海報紙就大作文章，嚷成一片……因為客觀形勢上，南京法院必須要重判周作人的，而在北京某些理解他的人心中，則又是寬容和同情。從解放後周先生寫給最高當局的信，以及後來周揚、陽翰笙、阿英等人代表組織、政府對知堂老人的各種寬容和照顧，可以看到周對黨、黨對周的理解關係。至於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，那是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」的必然結果，在劫難逃，多壽反辱，只怪他老人家活的太長了……又有甚麼說的呢？

而且知堂老人的複雜情況，還有一點，就是家務關係。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同這些扯在一起的那些連篇累牘的東西，如無婆婆媽媽，喜歡探聽東家長、西家短的癖好，便可以不看。只看看魯迅先生自己的文章、書信、日記好了。倒是《胡適的日記》1922年8月11日所記，和俞平伯先生寫給胡的為知堂

老人陳情的信應該選進來。那真是既見交情，又見交態的文章。

至於知堂老人的具體印象、音容笑貌，我過去寫文章說的已不少，冷飯不宜多炒，不想再多說了。

半個世紀的沈從文印象

說完知堂老人，再說說沈從文老師。早在淪陷時期，我讀高中時，就十分仰慕沈先生，當時沈先生的堂內弟張中和是我同班的好同學，就常常說起沈先生，同時也知道沈夫人筆名「叔文」，巴金在上海編的文學叢書，某一集中出版過她的一小本散文，我還借了來看。當時根本沒有想過將來會認識沈先生，而且還會作他的學生。因為當時沈先生遠在昆明，不只路途遙遠，而且是兩個世界，中間隔着炮火連天的戰場……這是1941、1942年的事，已是五十多年的悠悠歲月過去了。

抗戰勝利，北大復員，回到沙灘，我居然作了沈先生的學生，而且是補修的必修課：「現代文學選講及習作」。偽北大文學院的課，基本是按「七七」事變以前排的。不論必修、選修，沒有現代文學這門課。雖然新文化運動是從北大興起的，而隨五四運動而興起的現代文學也是從北大興起的，可是當時沒有人把這當學問，更不會在大學堂講白話文、白話小說。好像知堂老人讓廢名先生講過新詩，還編過講義，可是淪陷時期的北大中文系卻沒有這一類的課。西南聯大有這一門課，是一、二年級必修課。我當

早在我讀高中時，就十分仰慕沈從文先生。當時根本沒有想過將來會作他的學生，因為當時沈先生遠在昆明，不只路途遙遠，而且中間還隔着炮火連天的戰場……這是1941、1942年的事了。

沈從文先生是20年代末在上海中國公學走上大學講壇的。當他第一天上課時，教室坐滿人，他在講壇上站了十多分鐘，說不出話來。突然他驚叫了一聲說：「我見你們人多，要哭了！」這是一句古往今來堪稱奇絕的老師開場白。

時已是四年級，就要畢業了，但因為要補修這門必修課的學分，便有幸作了沈先生的學生。當時北大是最自由的學校，平時上課從不點名，因而可以公然不來上課。有位要好的同學在天津兼差編報，照樣在北大外文系上學，照樣畢業。只要考試時到就可以了。當時沈先生在課堂上講些甚麼，我現在一點也想不起來了。只是習作，我記得十分清楚，有一次題目出一個字：「影」，我的卷子拿回來一看，稿紙中間直行中加兩三行芝麻小字，幾份課稿我一直保留到文革，才被抄家的「小祖宗」們掠奪而去，中國人的「苦水」真是永吐不完！

我第一次去沈先生家看望，是在西齋對面中老胡同，三間小北屋中。去年10月回北京，住在沙灘，又到景山東街閒逛，西齋西面的房子及西齋大門還在，對過中老胡同沒有了，蓋了很漂亮的宮殿式小樓房，一大片，掛着「成都市」的甚麼牌子，我也未細看。解放後和沈先生最暢快的一次談話，是1962年8月故宮開紀念曹雪芹200年展覽會前，我去外交部街歷史博物館宿舍看望先生，先走到後面，由一個角門進去，兩門北屋耳房，聊得很痛快。當時我不知道故宮開《紅樓夢》展覽會的事，是先生先向我作了詳細介紹。說展品多麼豐富，有乾隆南巡圖、乾隆妃子圖影、金、玉器皿，都值得去看。這樣我才連着去看了三天，見平生之所未見，收穫不少。後來就再未見面，一跳就是文革後了。1980年暑假，我是到小羊宜賓胡同去看望先生的。院子倒很好，垂花門裏順走廊到東頭西間小東房，臨街牆上

還有大窗，只是夏天上午東曬，下午西曬，整天無法工作。過了一年多，就搬到東交民巷東口歷史所宿舍五樓去了，我去過幾次，後來先生過忙，我也就少去了……這些我在好多篇文章都寫到過，不多說了。

沈先生是20年代末在上海中國公學走上大學講壇的，是胡適之先生最賞識的人，羅爾綱《胡適瑣記》「中國公學校長」段寫道：

沈從文只讀過小學，是胡適把他安排上大學講座的。選他課的約有二十多人，但當他第一天上課時，教室卻坐滿人，他在講壇上站了十多分鐘，說不出話來。突然他驚叫了一聲說：「我見你們人多，要哭了！」這一句古往今來堪稱奇絕的老師開場白，剛剛說過，就奔流似的滔滔不絕把當代中國的文壇說了一小時，特別對新興作家巴金等的評述，講得最詳細。

巴金94高齡，尚婆婆人間，而沈先生則在80年代末成為歷史人物。俯仰之間，唯有感慨繫之了。

與老舍的兩面之緣

最後說說老舍先生。這四位先生中，對老舍先生雖知之較早，後來卻無多少接觸，只能說有兩面之緣吧。我很早就讀老舍先生的書，初中時代讀《駱駝祥子》、《牛天賜傳》，那是從《宇宙風》上讀的。這時《宇宙風》連載這兩部書。後來我又從頭髮胡同市立圖書館借了《老張的哲學》、《二馬》、《貓城記》、

《蛤藻集》等書，一系列地讀過。我最愛讀《牛天賜傳》，因牛天賜是鄉下孩子，既讀私塾又讀小學，由鄉下進城，有些滑稽，我更愛看。覺得它比《駱駝祥子》好，《駱駝祥子》結局很悲慘，我不愛看，受不了。我當時認識不少拉洋車的朋友，生活很苦，但能混的過去。我想「祥子」是個別現象，個別現象代替不了整體。《老張的哲學》、《二馬》我也愛看，而《牛天賜傳》印象更深，老師說姑娘的眼黑的像珠子，牛天賜說姑娘的眼黑的像夜，老師大誇牛天賜是天才。夜該多好，又深沉、又空靈……都是老舍先生自己編的，正配合我當時的理解、欣賞水平，所以特別感興趣，也學着這樣筆調寫文章……

認識老舍先生，則在解放之後了。50年代初，先生剛回國，我初參加燃料工業部工作不久，當時燃料部東長安街新樓還未蓋，還在東交民巷西頭路南原華俄道勝銀行樓院中和重工業部一起辦公。請老舍先生來給青年幹部們作個報告，就在樓院後靠城根簡陋的禮堂中，講台上也真簡陋，連個講桌也沒有，只得一把椅子。是誰聯繫請的？我記不清了，只記得是我接待的。先生坐在椅子上慢條斯理地說了一頓由美回國的經過，說美國人不懂政治，沒有常識。先生在美國住在一個房東老太太家，要回國了，收拾東西，向房東太太告辭。房東太太問：「要回到哪裏去？」告訴他：「要回到北京去。」房東太太便問：「北京歸哪裏管？是不是歸香港管？」老舍先生一邊說，一邊笑着說：「美國人民多麼幼稚？一點常識

也沒有……」先生當時說話的神態，迄今浮現在我眼前……（回憶印象文寫到此處時，已是7月3日下午，香港回歸中國懷抱也已三天了）。

自此之後，再未與先生見面。1953年秋，我調華東，1956年我調到上海教書。這年暑假我回京，當時家住燈市口朝陽胡同，離新蓋文藝大樓很近，有好幾位老同學在裏面工作，進大樓對着二樓大廳賣茶、咖啡、點心。一天下午和二三友人坐着喝茶聊天，人很少，忽然見老舍先生扶着手杖進來，直到櫃台前買豆沙包、菜包。我看到連忙站起來過去和先生打招呼，說1950年冬天在燃料部先生作報告的事，先生居然還記得。閒聊幾句便握手告別了。當時正是先生創作完《方珍珠》、《龍鬚溝》等一系列劇本的時候，正是獲得人民藝術家榮譽稱號的前後，神采奕奕……哪裏會想到十年之後的「文化大革命」呢？四年前認識了先生哲嗣舒乙先生，並讀了他的文章，想想真是傷感！

五本「印象」書，有四本，也就是四位逝去的師長，也在我記憶中留下各種印象。撫今感昔，真是無限感慨，在革命時代的火燄中，他們都經歷了各種不同的「火的洗禮」。是時代的歷史呢？還是個人的歷史？是時代的悲劇呢？還是個人的悲劇？在烈火中真感到個人是太微小了，但願下世紀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重複同樣的命運吧！

鄧雲鄉 中國藝術研究院特約研究員，風土民俗學專家，著有《北京風土記》、《文化古城舊事》等書。

四位逝去的師長在我記憶中留下各種印象。在革命時代的火燄中，他們都經歷了各種不同的「火的洗禮」。是時代的歷史呢？還是個人的歷史？是時代的悲劇呢？還是個人的悲劇？但願下世紀中國的知識份子不再重複同樣的命運吧！